

丛书主编 程方平

化若集

YOU DUOSHAO ZHUANGYUAN NENG GOU ZHENZHENG CHENGCAI

张诗亚 著

当代
教育
名家札记丛书

张诗亚教授

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专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丛书主编 程方平

化若集



HUA RUO JI

张诗亚 著

当代
教育
名家札记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JIANG 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若集/张诗亚 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当代教育名家札记丛书/程方平主编)
ISBN 978—7—5651—0298—1/G · 1543

I. ①化… II. ①张… III. ①教育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918 号

书 名	化若集
作 者	张诗亚
责任编辑	周 伟 戴联荣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54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978—7—5651—0298—1/G · 1543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总 序

在大部头的教育“专著”充斥人们视野的时候,短小精悍的札记会给人们带来些许清凉,除却一点烦躁,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久违的真诚与激情,感受到对教育改革的深层期待。

面对现实中纷纭复杂的教育问题,整体的改革需要调整思路、转变观念、触动体制、采取实验、深刻反思;也需要更多点形而上的基础性突破,需要更多教育相关者有一叶知秋的智慧与探求。然而,在教育研究的领域中,浮躁之风日盛,一味地追求“办大事”、作注释、造政绩,动辄长篇累牍、面面俱到、高谈阔论,而对众多的具体教育问题多无真切的体验和关注,更缺少直指问题之根的坦率,教育研究的基本价值被漠视和计划化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受到质疑。

在今天的学界,大家依然还熟悉鲁迅。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呐喊着“救救孩子”,就是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教育的重要。而其选择用杂文为主要的工具与形式,也是为了能较快、较便当地针砭时弊、揭露问题,使教育能办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使中国人能挺起脊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他相信,文章著述的优劣不在长短,只要能切中问题与时弊,一样会深刻、精彩,一样能为沉浸于教育改革发展具体工作的人们带来启发和有益的参考。

作为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教育学者,多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关注宏观、中观、微观的教育和谐,关注思想与行动的互动,关注政策法规与现行体制的疏离,关注相关责任与义务的对等,关注研究道德的坚守与良好风气的形成等,是其义不容辞的追求。为了真正推进教育的发展,对教育问题的诊断与分析,是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不唯上、不唯权、不唯钱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的。在这些方面,不唯鲁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蔡元培、张謇、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张伯苓、陈嘉庚、竺可桢、马叙伦、叶圣陶等,都是教育界有此担当、有此见地、卓有建树,并能言简意赅地阐述教育问题的典范。

基于以上判断和考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当代教育名家札记》丛书编委会汇集了当今中国教育界部分知名学者的教育札记奉献给社会。第一辑推出杨东平、程方平、查有梁、张诗亚等四位著名学者的教育札记。

杨东平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中国教育蓝皮书》主编,2004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 50 位公共知识分子”。2007 年他的专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一名,入选 2009 年腾讯网“年度教育专家”(三人之一);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在教育界、环保界、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

程方平是中国第一届教育专业研究生,现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在教育史、民族教育、科技教育、教师教育、高等与职业教育等方面颇多建树;曾任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所长、私立华诚学校校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民选学术委员会主席;主编了《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中华文明史:教育卷》、《20 世纪文库·教育卷》、《国外教育行政管理研究》、《国外教师问题研究》、《20 世纪教育名著译丛》等,并入选 2009 年腾讯网“年度教育专家”。

查有梁是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教育研究丛书——《现代教育丛书》主编,在“三论”、课程研究等方面有广泛深入的影响,著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系统科学与教育》、《课程改革的辩与立》等。

张诗亚是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历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在教育技术、民族文化教育、教育基本理论等方面有突出的影响;著有《教育科学学初探——教育科学的反思》、《震荡与变革——20 世纪的教育技术》、《西南民族文化溯源》等,主编了《现代教育丛书》、《西南研究书系》、《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文库》等。

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尽管不同,但都具有学术的抱负、真诚和热情;既有传统教育学者的遗风,又有与时俱进的活力,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均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们在精研学术的同时,对教育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不少独立和独到的见解在教育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这次推出的札记,主要都是他们的自选集,是他们在一个时期就不同方面的教育问题发表的见解与建议,视角多元、思路开阔、文思敏捷、功底深厚、立场鲜明、品评到位、方法适宜、使命凸显、言语简明,既有探索性、诊断性和批判性,也有学术性、实验性和建设性。从他们的思考和研究中可以看到教育问题的方方面面,也可以看到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当前方兴未艾的教育教学改革有诸多可资借鉴与启发的地方。

在此基础上,本编委会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将国内当代卓有建树、思想敏锐、有使命和责任感的教育学者的札记、短文集成出版,继续为教育界和关注教育发展的人们提供些许难得的清凉。

《当代教育名家札记》丛书编委会

2010年8月

序

庚寅春，承程君方平盛情，约我写此随笔。

杂感随笔，非“正经”饮食，当不得顿。时下各色“科学评估”多，大凡冠以“省部级”、“国家级”。“名师”且为“全国的”，“优秀科研成果”亦为“国家级”。学位点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学校排名等等无不以此为据。

于是各色刊物有了“级别”，于是版面有了价码（潜规则也），于是各色“专家”应运而生，于是“跑部”、“运作”等公行无忌。

此类怪状中获利乃至暴发者，大半为官。非怪也，形成此类评估之制度推手，官本位也。

而随笔纯系“个体经营”，除“文责自负”外，与各种人事评聘、科研评估盖不相干。有感可以发，有情可以抒，有想可以随，不亦乐乎？不亦悠哉？至于所随之想社会价值如何？经济效益几多？盖不劳各级管理之大驾，读者诸公自有眼、有心。

集曰“化若集”，盖由善教与学者，能化斯时、斯地于斯人于无形之意蕴也。恰若风吹草伏之状也。《礼记·中庸》有“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之语。《孔子家语·本命解》又有“羣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之解。至北宋苏轼又谓“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御试重巽申命论》）。清人郑燮有：“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絪縕而出”（《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今人郁达夫谓“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结束的苦闷也一日一日地增长起来”（《沉沦·四》），皆为此意也。可谓从古至今，一脉传之道统。

而夫子又言：“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对此，《晋书·潘尼传》释之为：“学犹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万邦蝉蜕，矧乃俊造”，所以，此随笔集命之曰《化若集》也。

乍一整理，才发现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涂鸦有随笔。或见诸于报端，或忝列于刊物。此类文短，散遗不少。或旧报，或草稿，几次搬家能残留至今，实属不易。当时还无“电子文本”，只得重新录入。尽管是旧作，似乎仍可入时。为尊重历史，未敢有稍许删改。

集中收入教育研究类文章，其主旨仍在化有形于无形之虑也，化学科于常在也。以《走出李约瑟似的大山》为例，谈所谓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本在天人合一系统之中，按学科研究走不通之理；《教育学的突围》一文亦是此类考虑也。

有些系蒙邀讲座。如《说一》（重庆工商大学）、《说中》（河南大学）。信口雌黄，竟为有心者录音。故亦整理成文，一并结集。

集中有《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山水教育小论》、《读砚》、《紫定酱定忌空谈》等文。教育贵在一个“化”字，并非囿于课堂、书本。古人有言，“游焉，修焉，藏焉，息焉”，就是此意。是谓学无定学，师无常师也。

有悼文三，其一为写于十多年前之悼念马公骥雄先师之文。先生辞世，不觉已二十年矣，收入集中，聊可表弟子之怀念于万一矣；其二为悼念沈翁慕羽先生。沈翁者，马来西亚华人教育之前辈先驱。为兴华文教育于马国，披肝沥胆，数次坐牢，堪为楷模。我见沈翁是2006年夏，是时，亲炆驾车，我与内子一起专程至马六甲沈翁寓中拜谒，沈翁迎我夫妇于小院门外。其时沈翁已届九四高龄，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双目深陷，炯炯有神。赠我以《沈慕羽先生书法集》并手书“华夏俊杰”。又是炎夏，我别沈翁不禁已四年矣；其三为何君志平先生之墓志铭。志平，云龙白族人，与我相识于2004年，时任云南贡山一中校长。其为校长，办学于贫困之地，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卓有建树。任事真，待人诚。惜身患绝症，英年早逝，不忍唏嘘。集中收此墓志铭，聊慰穷乡办学之魂也。有贺秦师效侃先生八十寿诞之文一篇。当时有好事者在先生寿诞上大放厥词，余闻之愤愤然，即席陈词，为学生陶红录之，并整理后刊于校报，固有幸存世。今一并检出，结集再刊。

有辞赋数篇。《无名堂赋》为敝书房所赋。昔刘梦得有《陋室铭》以抒其居陋室而心怀天下之志，余写《无名堂赋》乃求温故而知新，寄托吾生之有涯

之情也。《三英赋》所颂之三英，盖福州女杰，皆为前福州女师（现福州教育学院）之校友。该院迁址，景观新建，勒石刻碑，撰《三英赋》聊可补壁也。《三中赋》乃为万州三中所撰。余幼年曾随姑母住万州，初入小学发蒙亦在彼地。撰此文乃情之所系。《莽林赋》为新近赴尼泊尔热带雨林所作，可谓恰逢其时也。

此集整理，编排所累者众：富强，晓巍，晓蓉，龙藜，陶红，陈雪，宝宏，江华，赵驹，能坤，谭莉，晓光均辛劳不少，此集付梓，或可为谢。

是为序。

庚寅小暑于无名堂

目 录

总 序	(1)
-----------	-------

序	(1)
---------	-------

悟 学 篇

走出李约瑟似的大山	(3)
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山水教育小论	(10)
说“一”	(20)
说“中”	(25)
我悟治学	(33)
教育学的突围	
——兼评《元教育学研究》	(38)
回归位育	
——汶川大地震周年祭之教育反思	(43)
教育理论的更新与现代教育的发展	(60)
教育学理论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66)
活的教育与教育学的活	(75)
问题与方法	
——在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80)
给博士生上的一堂课	(93)
有针对性的比较	(98)
教育之本与教育之用刍议	
——兼评“科”“教”关系认识中的误区	(101)
2007 年全国博士生(教育类)学术论坛论文集序言	(106)
素质教育与思维发展	(109)

巫山考古对教育学研究的启示·····	(114)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宇宙观教育·····	(120)
论大学主体精神的错位·····	(129)
论高中文理的分与不分·····	(138)

随 笔 篇

“送回冰棍世界”的启示·····	(147)
播种与揠苗的比较·····	(149)
“蜡烛”之类可以休矣·····	(150)
教学中的以“惑”为诱·····	(152)
也谈师范毕业生的“跳槽”·····	(154)
知识竞赛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156)
百年树人的两难·····	(158)
遗憾,诺贝尔奖金·····	(159)
学问人品无限情 ——忆马骥雄先生·····	(161)
立春,沈翁逝矣·····	(166)
何君讳志平墓志铭·····	(168)
傲立天地者必大寿 ——秦效侃先生八十大寿致词·····	(169)
生日忆·····	(171)
《无名堂吟稿》后记·····	(176)
特立西南,学行天下 ——“西南大学精神”释义·····	(180)
郑州九中精神并校训解读·····	(183)
精神,在陪都背后·····	(187)
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 ——在西南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的讲座·····	(189)
西南为坤·····	(196)

词 赋 篇

无名堂赋·····	(205)
三英赋·····	(206)
春雷赋·····	(208)
三中赋·····	(210)
茅台酒赋·····	(211)
莽林行·····	(213)
孔夫子颂	
——贺重庆工商大学南山书院孔夫子像落成·····	(215)
西南大学学位颁授誓词·····	(216)

鉴 赏 篇

读砚·····	(219)
紫定酱定忌空谈·····	(225)
元绿釉青花玉壶春刍议·····	(230)

悟学篇

2002年1月19日在贝尔法斯特巨人通道



百年之校，才俊辈出。女界之翘楚，舍林徽因、谢冰心、卢隐之榕城三英其谁？三英者，一代女杰也。其灵秀清丽，才气德行，人之所仰，世之所敬。其能无赋乎？

闽水清清兮养我名媛，于山郁郁兮育我淑仪。

仰鳌峰之伟岸兮，书院肇其端；集道统之大成兮，新学畅其源。但开风气，夺八闽之先；一奠鸿基，引四海之瞻。立教乎，有来无类；树人也，见贤思齐。夫风云际会，历亘古未有之变局；交替世纪，创千秋仅见之奇迹。东方醒狮，怒吼者惟恐和寡；南天翥凤，振羽者何患奋疾。有志者，沐鳌峰之惠泽兮，研也渊渊，考也究究；善学者，得先哲之教谕兮，文也彬彬，灵也秀秀。傍白塔以放眼，势接青云；登于山以舒啸，气运斗牛。御闽水而拥大海，广胸襟以博爱；共帝师而忧天下，富情怀以厚载。生于大海兮波涛万顷天来，游于五洲兮气度超凡世盖；乡土润根兮其发必茂，京城振羽兮其飞也帅。

走出李约瑟似的大山

如果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中划代,李约瑟,当是第一代人的代表。尽管在他之前,如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所言,中外已有不少学人涉足此领域,如,技术史有李俨和钱宝琮;化学史,中国有20世纪30年代的吴鲁强,外国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斯(Tenney Davies),加州大学的约翰生(Obed Johnson)等等;数学史有日本的三上义夫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此以前,这一切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应有的注意”,而使这一研究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无疑,自李约瑟始。

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始于1937年。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中包含有大量科技方面成就的这一客观存在,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在某些有偏见的西方人眼里,保守的中华文明哪有什么科学——那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有的不过是些实用技术罢了。那又算得什么?有趣的是,这种偏见促使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为此,他把自己卓有成效、进展极为顺利的生物化学的研究终止了。李老说:“某些西方人也许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根本上是讲求实效的人,有能力完成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创新,但这些创新没有一样是他们所谓的科学。即使他们认为有一些可以算作科学,但也会怀疑这些科学深受西方的影响。为此,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目的,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观念,打破这种无知,肃清这种误解,把人类文化的不同源流归结到一起,就能发现它们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万流归宗的”。

实际上,认真探讨一下,便可发现,无论在李约瑟之前,或在他本人以及他之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共识都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中存在着很多技术和科学的成就。而这些又是同中华文明的其它方面紧密契合在一起的。尽管中华文明不同于希腊、埃及、印度等其他古文明,但是,自培根以来所创立的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超国界、超文明的。因此,可用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体系,如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分类;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生产流程等科技结构等等一整套来耙梳、整理、判断、评价任何文明中的科技成就。即是说,近现代的科学体系对其它文明具

有普释权。可以用这体系的理论解释任何其它文明中的技术成就、科学思想等等。这样看的不仅如李约瑟等对中国科技史持充分肯定态度的学人，而且也包括那些为李约瑟所批评的对中国科技成就持有偏见的学者。区别仅在于，后者认为，用此标准衡量，中华文明中没有科学思想，因而不及格；前者则认为，中华文明不仅及格，且相当出色，领众多领域风骚于世界前列。可见，这个认同基础是批评者和赞成者共用的话语体系。而李约瑟的研究实际上证明了肯定者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将从两方面来讨论：

第一，如果我们赞同近代科学理论体系，对中华具有独特性的文明，包括其科学技术的耙梳、评价、判断、解释等等，具有普适性，那么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划分便是顺理成章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这套体系对中华文明及其科学技术等不具普适性，我们即将引出中国科技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到公认之后，在李约瑟之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又该怎样进行的话题。

如认同普适性，那么，试比较一下，为什么李约瑟之前的研究者无法使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得到世界学界的承认。何丙郁的意见颇有说服力。他认为李约瑟是一位成名的科学家，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他和中国有特殊联系，从重庆时期至朝鲜战争时期，很多人反对他。仅他的学院和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同事们，同情者和反对者大约各占半数。同情者固然希望看到他的著作，反对者也想看他到底折腾些什么。尤其是当时的大部分汉学家，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具备足够条件写有关中国的问题。他的书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社备受西方学术界重视，书籍一经该社出版，便可谓登上龙门，身价陡增。除上述三条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原因。

一、不能只从单一学科领域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

李约瑟则是从整体上树起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大旗，且鲜明地提出，这一研究必须同认识评价整个中华文明结合起来进行。换言之，这一研究既然是从整个中华文明中去发现、整理、耙梳、判断、评价、分析、解释其中国科技方面的内容，就必然牵涉对整个中国科技史的评价和认识。这一点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文(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样，日文翻译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译为《中国の科学 と 文明》。台北译者译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中科院的译本采取的则是原著的中文名

《中国科学技术史》，应该说这一名称不如《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这既然是对整个中国科学技术乃至中华文明的再评价、再认识，其所产生的影响就势必比仅从单一学科进行研究产生的影响来得大、来得广泛。

二、研究中国科技史便是研究中国

科技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引起世界学术界重视，实际上是借了自抗战以来民族危机空前，而要奋争、崛起的东风。抗战时中国已成为亚洲反法西斯中心，频发的众多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当大陆政权新旧更迭之后，中国为什么发生巨变，其前途如何，对世界将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在更广、更高的层面，引起世界舆论界的重视。当其时，对中国科技乃至中华文明重新认识，无疑会成为汉学家们的热点。而对整个中华文明进行评价势必涉及众多学科，是个跨学科的重大课题。而这居然由一个生物化学家来做，赞成和反对的声音，自然都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研究成果出来后，又为剑桥这一西方学术中心的出版加以肯定，其影响的非同寻常也就顺理成章了。

何丙郁也提到：20 世纪 50 年代“东亚病夫”的身体刚刚复原，睡狮正在伸腰，随时准备站立起来，引起全世界注目。这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至卷三相继问世，都获得高度评价。结果远远出乎赞同者和反对者的意料之外，没想到，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居然超过了很多长期从事汉学研究的专家。另一方面，这个“门外汉”的研究之所以能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肯定，靠的就是这套具有普适性的、以近现代科技体系为中轴构成的话语体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世界学术界所认同的体系来耙梳、整理、评价、解释一个完全陌生的、渊源流长的巨大文明，那么，中华文明中所蕴藏的科技成就，便无法进入交流，让人认识。所以，具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应该说是中国科技史能得到世界学术界承认的关键。

李约瑟的研究致使中国科技史终于走向了世界学术舞台。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夏鼐先生还在谈，科学技术史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历史的问题。因为它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归宿几经波折，既有属于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又有划归科学院的时候。英国从前最高的学术机构是皇家学术机构，为了讨论自然以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并给予其学术承认，才分出一个英国学术院。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正因为